

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背景资料

（一）概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是政府间的国际金融组织，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它是根据1944年7月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的。1947年11月15日起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至今，IMF已有187个成员国。

（二）职能

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国际汇兑；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促进国际货币合作。

（三）组织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由各成员派正、副理事各一名组成，一般由各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每年9月举行一次会议，各理事会单独行使本国的投票权（各国投票权的大小由其所缴基金份额的多少决定）。

执行董事会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负责处理该组织的日常工作，行使理事会委托的一切权力。执行董事每两年选举一次，总裁由执行董事会推选，负责基金组织的业务工作，任期5年，可连任，另外还有三名副总裁。历任总裁按惯例均由欧洲人担任。2011年6月28日，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被选为新一任总裁，成为该组织自1944年成立以来首位女性总裁。

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进程

2008年4月19日，IMF理事会投票批准了关于投票权和份额的改革方案。此方案将适当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根据这一方案，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例将从10.5%上升至42.1%。中国在IMF的份额将增加到3.997%，投票权增至3.807%。

2009年3月24日，IMF宣布对贷款框架进行“大修”，其中包括改进借款条件，主要手段是推出新的无附加条件贷款工具——灵活信贷安排(Flexible Credit Line, 简称FCL)；其次，适度放宽金融危机中最常用的贷款形式——备用贷款安排(SBA)的放款条件。

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公报显示，此次峰会就IMF改革达成了一致：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支持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配额；支持多边发展银行(MDB)至少100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确保为贸易融资提供2500亿美元的支持；利用IMF已经同意的出售黄金储备的所得资金，为最贫穷国家提供优惠融资。这些协议共同组成了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旨在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

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就IMF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份额分配”达成一致。发达国家承诺将把部分配额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配额将提高至48%，由此发展中国家在IMF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

2010年10月，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韩国庆州举行，与会代表就IMF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欧盟国家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中让出两个席位给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将显著增加。

2010年11月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就份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根据该方案，发展中国家份额将升至42.3%，我国份额占比将增加2.398个百分点至6.394%，投票权将升至6.07%，排名从并列第六跃居第三。该方案将实现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份额达6个百分点，基本满足G20匹兹堡峰会所要求的目标。该方案要求各成员国尽最大努力，加快各项审批程序，争取2012年基金组织年会前使本轮份额改革方案正式生效。

2011年7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官方网站显示，原总裁特别顾问朱民的头衔正式更换为副总裁，这是IMF增设的第四个副总裁职位。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朱民无疑对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会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改革的复杂性，朱民在其中的角色可谓是任重道远。

2011年9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11年年度会议结束，根据会议公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改革取得新进展。本届年会期间，与会者审议了《综合多边监督报告》，预计将在下届年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年期监督检查和一系列溢出效应报告的基础上，建立更加集成化的、公平和有效的监督框架。这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风险监督的有效性，以及加强危机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2011年10月15日，20国集团部长会议达成的《20国集团重申解决危机的承诺》指出，在资本流动方面，20国集团已合意达成一系列一致结论。IMF在应对资本流动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在监督工作方面，IMF不久将完成对其监督工作的深入研究，并将在一些领域提出建议；在地区性金融安排合作方面，IMF将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另外，20国集团部长还要求IMF在现有贷款工具和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新方法。并承诺确保IMF具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履行其在系统性方面的职责，并期待戛纳峰会就辞问题进行讨论。

2011年11月2日，为了降低全球持续的紧张局面和经济的不确定性，IMF发布了新的工作计划，计划中强调了接下来几个月的战略重点。当务之急，是提供深刻的分析和政策建议来弥补脆弱性、促进增长以及提供就业机会。IMF将增强机构的贷款工具，以降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阻止和解决危机。工作计划也会把全球经济的关联性作为重点。

2011年11月4日，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峰会在法国戛纳落幕，会议发表了《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宣言》，宣言指出：我们在国际货币系统的改革方面已取得进展。我们认为，特别提款权（SDR）的组成应继续体现各种货币在全球交易和金融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SDR组成的评估应基于现有标准，我们将要求IMF进一步阐明这些标准。为体现货币随着时间推移的角色变化和特点，SDR的组成将在

2015年甚至更早时进行再评估，而符合现有标准的货币才能进入SDR的“篮子”。

我们还承诺进一步推动IMF的监管，使之变得更有系统、更为公平和更有效率，以及更好地确定和化解溢出效应。虽然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增强监管，我们同时意识到有必要更好地整合双边和多边监管，我们期待IMF在明年初提出一个新的综合性监管决策。

我们同意继续努力来进一步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我们将支持IMF推出新的预防流动性额度(PLL)，向面临外部冲击的具有稳固政策和基本面的国家提供依情形逐渐增加的、更为灵活的短期流动性。我们还支持IMF推出一个单一工具，满足其成员国的紧急援助需要。我们呼吁IMF迅速讨论和完成这两个方案。

我们将确保IMF继续拥有足够资源扮演系统性角色，服务于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同时将增加我们自2009年伦敦会议以来已动员的大量资源。我们已做好准备，确保能及时动员更多的资源，我们要求我们的财长在下一次会议上进行合作，配置一系列的不同可选方案，其中包括双边性地增加对IMF和SDR的贡献，自愿向IMF的诸如管理账户等特殊结构捐款。我们将迅速完全执行IMF的2010年配额和管理改革。

(2011年11月5日 来源：国际在线)

2011年11月4日，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20国集团戛纳峰会上发表的声明，对峰会宣布的《促进增长和就业的戛纳行动计划》和其他举措（包括支持基金组织向其成员国提供援助和促进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表示欢迎。

她还指出，“领导人支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基金组织的作用，我对此深感鼓舞。首先，我欢迎20国集团作出的确保基金组织将继续具备足够资源的承诺；第二，基于基金组织已采取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基金组织的贷款工具箱，以帮助所有成员国应对危机），我将与基金组织执董会共同努力尽快通过一项新的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PLL），以便向那些政策和经济基本面良好，但却面临系统性冲击的国家提供更多和更灵活的短期流动性支持。第三，20国集团强调了进一步加强基金组织监督作用的重要性。”

三、 专家评论

IMF 改革刚刚起步

2009年03月27日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针对IMF对贷款框架的“大修”，IMF主席卡恩称赞其是IMF的“重大变革”。他认为，“更多的贷款灵活性和合理的附加条件将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回应成员国的需要，这会有助于他们渡过危机和恢复可持续增长。”

巴西财政部长 Guido Mantega 也表示欢迎，“这可使IMF出手更快。”

但是部分学者认为改革力度不够。“IMF自称是改进贷款条件，我认为只是软化贷款条件，改革的成果是微弱的。” Morris Goldstein 说。

新的贷款机制将不会替代SBA，SBA仍将是IMF主要的贷款形式，而对于SBA的附加条件虽有软化却并未取消。“FCL虽好，但只有极少数中等收入国家可以使用。” Morris Goldstein 说。因此，IMF贷款条件的改革对成员整体影响有

限。

IMF 的借款工具分为两类,针对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和不针对低收入国家的非优惠贷款。目前 IMF 中有效的贷款项目中有约一成为前者。下一步,IMF 将对低收入国家贷款工具的贷款条件进行改革并扩大对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资源。

“这不是最后结果,还有其他方面需要着手应对。”IMF 副总裁卡恩说。

这其中最繁重的工作是份额改革。20 国集团财长在本月早些时候达成一致,将下一次 IMF 份额审核时间至少提前两年,到 2010 年 1 月之前。与会国同意“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最穷经济体,应具有更大发言权和代表权”。

但份额改革将很难在今年之内实现。因为份额改革需要 IMF 全体成员国代表投票通过(IMF 目前有 185 个会员国),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还需要国会批准。中国目前在 IMF 的份额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只是,IMF 在贷款条件改革上迈出一步都如此艰难,未来的改革不知还会遇到多少的障碍。

易纲: IMF 份额应“动态自调”

2009 年 10 月 09 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是各国关注的焦点。10 月 4 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第二十八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部长级会议”上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建立份额自动调整机制,及时反映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变化。

易纲表示,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未能及时预警本次金融危机,与其近年来监督方向和重点的偏离有关。因此,主要国际金融组织需加快根本性改革。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长期低估、代表性不足,是 IMF 治理结构不合理、监督不公平的重要原因,影响到 IMF 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历史形成的不合理份额分配和调整方式加剧着这一问题。在 20 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上,IMF 提出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少 5%的份额改革目标。

易纲强调,IMF 是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份额应是其主要资源,而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其通过各种方式增加资源。从中长期看,IMF 应建立份额自动调整机制,及时反映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变化,避免出现成员份额严重偏离经济现实的情况。“我们敦促尚未完成 2008 年份额改革国内审批的国家尽快完成审批。”易纲说。

在完成份额改革基础上,易纲表示,将支持 IMF 进行更广泛的治理结构改革,加强执董会职责,加大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遵循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改革总裁遴选制度等。管理层和工作人员中应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以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合法性。

为加强 IMF 监督各主要金融市场,综合考虑成员各项政策,易纲呼吁尽快全面修订《2007 年决定》;支持 IMF 对低收入国家贷款工具和融资机制实施一揽子改革措施,增加低收入国家非优惠融资灵活性。

在经济复苏过程中,IMF 的作用备受关注。易纲认为,IMF 既要在政策协调中发挥应有作用,又要进一步加强对各种风险因素的监测与分析,尤其要加强监督各主要市场金融部门重组进展和刺激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情况,加强监测国际资本流动,促使主要储备货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

易纲指出,促进全球增长的根本途径是各国加强合作与协调,通过建立更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全面深化结构改革和优化资金的全球再分配等一揽子政策措

施，加快劳动力、产品和服务市场等广泛的结构改革，提高其潜在增长力。IMF和世界银行应尽快研究利用多边机制，推动资源更多流向发展中国家，提高其经济增长潜力，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

IMF：未来的金融“联合国”

2009年10月14日 来源：深圳新闻网-深圳商报

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将大权在握，但合法性受质疑。在匹兹堡峰会上，G20赋予IMF对成员国提供经济建议并监督政策落实情况的权力。但合法性从哪里来？

在日前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伊斯坦布尔年会上，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有席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这次年会将可能是一个崭新的IMF的起点，“将来你与孙辈们谈话时可以说，那一天你在伊斯坦布尔见证了这一时刻。”

卡恩信心满满的背后，就是这个坐落在华盛顿市中心的国际金融机构，正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并将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中心角色。对于这一点，卡恩此前在接受笔者专访时也表现出当仁不让的气势。他说，在这个新秩序中，IMF可发挥领导作用。

“在应对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机构发挥领导作用。20国集团(G20)正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但它仍不代表所有国家。”卡恩当时这么说。

“IMF能扮演这个角色吗？我认为可以。但首先我们必须能够解决自身的代表性及效率问题。”

未来的IMF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目前大致有两种答案。

第一种就是卡恩的构想。在他看来，IMF将会成为一个某种形式的“全球性央行”，手中握有1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可在成员国陷入危机时伸出援手。作为“央行”，IMF将担负起监管全球金融体系的重任，以后大到各国金融政策以及国际协调，小到公司的高管年薪以及银行资本准备金率，可能都有IMF的踪迹。

但对于“央行”的角色，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过于激进。IMF政策委员会轮值主席、埃及财政部长加利就认为，“央行”一说“太过极端”，而应该说IMF将会成为国际“结算中心”，担负起监管任何关系到全球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

这其实就是目前的第二个构想，即让IMF担任二十国集团的常设办公机构。因为G20既无总部、也无太多专职人员，而IMF在应对全球性危机上有经验、有现成的机制，由IMF来执行具体政策是现实的选择。换言之，在以后的全球性经济金融问题上，G20是董事会，IMF则为执行部门。

在匹兹堡峰会上，G20就赋予IMF对成员国提供经济建议并监督政策落实情况的权力。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伊斯坦布尔年会上也强调，世界期待IMF能在协助评估G20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以及为全球经济如何实施再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但合法性从哪里来？这是卡恩的担忧，却也是不争的现实。60多年来，IMF和世界银行一直由发达经济体掌控，金融首长完全为欧美国家垄断，这显然背离了当前时代的潮流。

在前两次国际金融峰会上，G20领导人都重申，要推进IMF和世行两机构的改革，“使其更充分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匹兹堡峰会决定，将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5%的IMF份额。这无疑有助于为

IMF 赢得更多信任。

IMF 正在获得新生,不管是哪种选择,该机构都可望成为未来金融世界的“联合国”。但联合国缺少了安理会,就无法称其为联合国,IMF 会有其特色的“安理会”吗?或者,如卡恩所倡言的,IMF 会拥有对成员国经济金融政策“点名和羞辱”的权力吗?这是一个疑问,也肯定会成为改革的难点,尤其是考虑到 IMF 仍处在西方掌控下的现实。

在此次伊斯坦布尔年会上,IMF 再度重申,将加快份额改革,使之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改革无疑将是艰难而缓慢的。但没有人能够阻碍时代的潮流。

《华盛顿邮报》就认为,尽管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方能成形,但“IMF 肯定将在处理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中心角色”。(刘洪)

IMF 改革新进程

2011 年 7 月 25 日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尽管拉加德及前任卡恩都强调,要继续推进 IMF 治理结构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但 IMF 改革之路依旧漫漫。

拉加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未来几年,IMF 将继续推进自身治理改革,以加强有效性与合法性,这一动态的改革进程至少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落实前期包括份额调整等改革成果。去年 11 月 IMF 执董会批准了最新的份额改革方案,根据这项改革,超过 6% 的份额将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尽管份额改革计划已得到 IMF 同意,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在有些成员国,批准此类方案需要经过复杂的立法程序,因而耗日持久。

拉加德在 6 日发布会的开场白中就强调,她离开法国赴华盛顿任职之前,就确保法国议会通过了去年的份额改革计划,但很多成员国还需继续做完自己的“家庭作业”。

对当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而言,即便经过几次份额和投票权调整,中国在 IMF 内的份额和投票权依然与其全球经贸强国的地位不相称。

“中国是 2010 年份额调整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的代表性曾严重不足,我相信情况会继续变化。”拉加德 11 日强调。

第二个层面是在 2012 年底前,欧洲要在 24 人的执董会中让出 2 席,将总席位从 9 席减少至 7 席,这方面的磋商因为涉及欧洲国家之间的利益调整,并且将使欧洲国家在执董会中的总席位比例降至三分之一之下,因而艰难的磋商工作至今没有完成。

第三个层面是要定期检视和调整 IMF 份额的构成。拉加德说,IMF 会定期检视和调整成员国的代表性,以充分反映成员的规模、人口、经济总量及国际影响力等,不过改革份额构成调整涉及很多技术细节,这也将是一个跨年度的长期工程。

朱民履新任 IMF 副总 代表新兴市场国家声音

2011 年 7 月 28 日 来源:半月谈

7 月 26 日后,作为 IMF 新任副总裁,朱民的声音将让各方侧耳倾听。此时,他既被寄望于为中国等新兴国家争取利益,又要服从 IMF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共同利益,如何拿捏“火候”和掌握平衡,将是朱民履新后必然面对的考验。

从中国在 IMF 的份额和投票权的提升,到朱民的任命,表明西方主导的世界权力格局开始正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日渐强大的经济实力,毕竟当美欧经济

在金融危机期间哀鸿遍野之际，中国经济依然是全球经济的亮点，并为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了超过 50%，而今，中国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朱民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是“水到渠成”：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崛起为全球走出危机做出了很大贡献，朱民任职也反映出金融危机之后的一个新格局，即国际金融机构更尊重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声音了。

拉加德上任之初承诺将继续推进 IMF 的改革，并加强对世界经济有重大贡献的国家如中国在 IMF 的合适的代表性。拉加德对朱民给予极高的评价，也寄予厚望，其中之一就是希望他帮助“增强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

拉加德在宣告对朱民的提名时称，朱民具备政府、国内政策制订和金融市场的丰硕教训，高明的治理和沟通技艺，以及对基金组织的深入懂得。同时，拉加德也表示，在今后 5 年的任期内，她将推进 2010 年确定的份额转移方案，继续提高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以反映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发生的变化。

然而，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掌控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决定权的格局并无实质变化。尽管经过去年 IMF 的改革，中国的投票权从 3.65% 升至 6.07%，但依然不及美国投票权（约 17%）的零头。目前，七大工业国(G7)在 IMF 的投票权达到 44.3%，较上百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总和 40.5% 还要多。

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认为，没有人能找到什么理由来反对中国在 IMF 中获得一个高层级职位。但是，朱民的任命并没有打破 IMF 的“潜规则”，他对于 IMF 因为美国和欧洲不愿意给新兴市场让权，不得不增设一个职位的作法感到“不幸”。

IMF 能否闯过国际金融危机“险滩”成关注焦点

2011 年 7 月 28 日 来源：中国财经报

6 月 23 日，作为总裁候选人，拉加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进行了竞选陈述，对于该组织的未来方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当选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拉加德认为必须不断提高和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尤为关键。

第一，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推进该组织治理结构的改革。合法性是接受任何改革的先决条件。应根据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形势，不断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与份额。作为先期的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首先完成在 2010 年达成的份额与治理结构改革方案，给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

第二，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效性，继续保持该组织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合作中的关键作用，这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工作职能，包括经济监督、危机防范和救援等。监督方面，除了继续对已有的监督框架进行修改与完善外，还应该不断充实监督力量，扩展监督内容。如应将金融部门专业知识纳入监督工作中，在监督内容上还应考虑结构性和公共财政问题以及社会和就业政策等。危机救援方面，应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充分的资源和充足的工具，确保该组织具备解决系统性冲击的能力。

拉加德还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团队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涉及性别、文化、学术背景、地理分布等多个方面，该组织应确保工作人员的机会均等。促进工作团队的多样化将有助于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提升该组织的工作能力，提高其有效性。

拉加德所提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方向在其正式就任总裁后得到初步确定,如果未来不发生重大变动,该组织改革将会沿着以上方向逐步推进。改革的最终目标,按照拉加德当选总裁时发表的声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目的明确、反应迅速、有效并且合法,以促进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并为所有人谋求美好未来。

四、 学术论文

廖凡:《国际货币体制的困境与出路》,《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制渊源于大国之间的政治妥协,在约束性和执行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导致该体制的代表性受到质疑,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揭示出其所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机构职能误入歧途、政策监督顾此失彼、治理结构力量失衡以及争端解决有心无力。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应当在近期已有改革举措的基础上,在重塑机构职能、加强双边监督、完善治理结构和促进争端解决四个方面寻找出路。

李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职能趋向》,《法学》,2010年第4期

IMF目前陷入了严重的职能困境:不公平的份额制导致其为发达国家所主导,危机管理职能难奏实效;资金短缺问题成为制约其危机贷款职能发挥的瓶颈;在预防金融危机方面,IMF所能提供的技术支持和合作协调作用也十分有限。

对IMF职能角色的反思是IMF改革的动因之一,对职能角色的重新定位则应是IMF改革的旨趣所在。IMF改革应着力于完善四项基本职能:汇率监督、贷款援助、技术支持、合作协调。其中,对汇率监督职能应以公平性和指导性为基础有所分化;贷款援助职能应有针对性强化;技术支持和合作协调职能则亟须强化。

李扬:《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中国的机遇》,《中国金融》,2008年第13期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被国际社会热议了半个多世纪但仍无结论的问题。本文认为,目前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非关键货币国家始终处于汇率波动的风险之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在国内经济形势要求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间左右为难,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形成亚洲货币合作机制。

李若谷:《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金融》,2010年第5期

对自由市场的盲从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要想避免这样的危机,就必须重新认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使金融危机危及全球经济,本文认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就要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其中,最主要的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向松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何去何从》,《中国金融》,2010年第11期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美元依然主导,欧元面临挑战,人

心向往多元。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概有三大立场，一个使美国立场、一个使欧洲立场、一个使发展中国家立场。

本文认为，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第一个是继续跟着美元本位制随波逐流；第二个是积极参与改革 IMF 和 SDR，使其真正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和国际储备货币；第三条道路就是积极推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最终实现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这是中国应该采取的正确道路。

张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背景、原因、措施及中国的参与》，《国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 01 期

传统的美元本位制很难解决国际收支周期性失衡的问题，且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地位。未来的货币本位制可能是多极货币共同充当全球储备货币，这将为储备货币发行引入新的竞争机制，且较好地克服特里芬两难。IMF 在次贷危机前面临份额、贷款、监测与资源四个方面的挑战。

危机爆发以来，IMF 在贷款与资源层面的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在份额与监测方面乏善可陈。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全球范围内跨境金融监管机制的缺失，危机除了促进全球监管机构反思监管理念外，也将金融稳定委员会塑造为未来实施跨境金融监管的重要平台。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包括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敦促 IMF 进行治理结构改革，以及通过国内结构性改革来促进国际多边合作。

纪东：《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展望》，《中国商界》，2009 年第 9 期

特里芬难题告诉我们，以单一主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生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无法摆脱金融危机与崩溃的结局。建立一个以超主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为各国的共识。本文认为，特别提款权在数十年的改革与演进中天然的具有了“超主权”的性质，是今后国际货币的发展方向。

陈文佳、胡亮：《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经济论坛》，2010 年第 06 期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美国开动印钞机又将造成国际美元流动性过剩，这必将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一定冲击。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从长期来看，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现实选择。对于人民币而言，目前的经济形势有利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实现人民币走出去战略。

王松奇：《也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银行家》，2009 年第 04 期

G20 伦敦金融峰会召开前夕，周小川行长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震惊了全世界。近年来，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体有四种主张：(1)维持现状，只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些小打小闹的改良；(2)推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让世界储备货币多元化制度化，由美元主导体系走向多元主导体系；(3)的推动建立全球单一化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座掉美元的主导货币和核心储备资产角色；(4)向黄金本位或商品货币回归，强调黄金和商品在全球货币发行中的支撑地位。

本文认为，除第四种主张具明显脱离实际特征外，其他三种主张都可视为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实选择。而中国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积极准备

制度条件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宗良、李建军、辛本胜：《IMF 治理机制基本框架的演变、困境与变革前景》，《中国货币市场》，2011 年第 9 期

作为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IMF 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介绍了 IMF 治理机制的基本框架及演变，分析了其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如决策权更多地被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危机处理能力不足等，指出 IMF 应顺应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变化，不断完善机构自身治理，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提升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能力。